

岳谦厚 李卫平 著

从集体化到『集体化』

1949年以来郝庄的经济社会变革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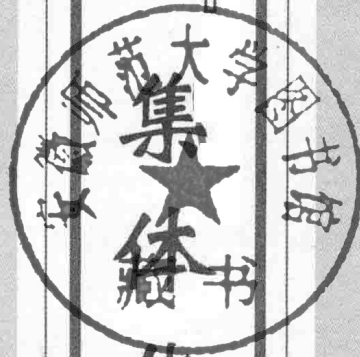
F323
178

岳谦厚 李卫平 著

从集体化到

『集体化』

1949年以来郝庄的经济社会变革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集体化到“集体化”: 1949 年以来郝庄的经济社会变革之路 / 岳谦厚, 李卫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161 - 7054 - 0

I. ①从… II. ①岳…②李… III. ①农村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②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850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75
插 页 2
字 数 209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基金

(项目编号11YJA770064)

山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基金

(项目编号2013041056-02)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郝庄村的经济社会生态	(28)
第一节 村庄概述	(28)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前夕村庄的社会面貌	(32)
第二章 集体化的前奏:村庄土改与劳动互助	(36)
第一节 划分阶级与“平分土地”	(37)
第二节 土改与乡村经济社会变迁	(46)
第三节 互助组的组织与困局	(50)
第三章 集体化的启动:村庄初级合作社的创办	(55)
第一节 农民生产资料入股分红	(56)
第二节 乡村社会交换	(59)
第三节 集体化的动因	(62)
第四章 集体化的高潮:从高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运动	(66)
第一节 农民生产资料公有化	(67)
第二节 高级社的组建与运作	(71)
第三节 人民公社化运动	(81)
第五章 惠农政治下的新型“集体化”:非农化中的道路选择	(114)
第一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114)

第二节	非农化的经济现代化探索	(137)
第三节	村庄发展与农民生活	(149)
第四节	新型“集体化”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158)
第六章	“郝庄道路”与郝庄的道路	(174)
第一节	“郝庄道路”:新型“集体化”的社会效应	(174)
第二节	从集体化到“集体化”:国家政治与乡村经济 关系之演变	(179)
第三节	郝庄的道路:未来将向何处去?	(181)
主要参考文献	(184)
后记	(199)

绪 论

一 课题研究的价值

近代中国的历史使命是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富强，国家独立在 1949 年就已实现，民族富强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间，虽然伴随着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慢慢富裕起来，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中国社会再次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急剧转型期，而这一转型期最突出的问题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具体而言，经济领域的现代化目标主要在于“求富”、“求强”，即采取何种措施才能真正使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摆脱贫困并成为“大”而“强”的国家，进而使人民群众过上幸福安康的好日子。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社会各阶层都在寻求出路。如罗荣渠与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等一批中外学者对中国现代化进行探讨时认为：中国是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衡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经济现代化即工业化问题，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与农业生产是中国经济的基本表现。中国要想走上工业化道路，关键是乡村经济要实现工业化，且最好能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境中转变乡村经济发展模式，农业劳动力得到就地转移，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此种走向工业化道路的模式早已被西方国家进行过多次试验，而且先后都获得了成功。中国自然不能“免俗”，自 1840 年以来就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即政治上由君主制向民治转变，经济上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或工业转变。然而中国这一转型历程步履维艰，直至现在仍在蹒跚前行。那么，在这一经济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乡村经济是如何由传统小农经济转向具有现代特征的工业经济的？换言之，中国乡村是如何实现工业化的？

承前所述，自 1840 年以来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步走向解体，家族集权政治走向衰落，而商品经济愈益发达，现代国家渐渐生成，社会秩序经历

了纷繁多样的变动。在这一变化秩序中的各个政权都为适应时势变迁采取举措构建自己预设的乡村秩序。其中，清政府和国民政府对乡村的改造尽管取得了某些成绩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效仿苏俄选择底层革命的共产党对乡村秩序的重构则取得了成功并实现了国家整合。在共产党新生政权得到初步巩固之后便开展了对国家的全方位建设，对农业和乡村继续进一步改造，但从其效果来看，前期的改造并不理想，仅仅实现了共产党对乡村的社会控制，而未实现乡村的现代化。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经济现代化问题日益凸显，乡村经济的现代化关系着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命运与进程。对于解决这一问题，共产党是采取何种措施成功实现乡村经济现代转型的且其乡村改造又是何以成功的？国家或政府在乡村经济变革进程中起了多大作用？乡村自发型的经济变革是如何展开的且又有哪些具体表现？在这一转变中乡村经历了哪些变化？国家政治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

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征，亦是其通往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众所周知，传统中国社会的主体是农村，而仅有的少数城镇亦是借助于政治和军事功能才发展起来的，像西方那样自发型的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城市则鲜见。近代以来，在城市化浪潮驱动下，中国城市化步伐渐渐加快，尤其是在共产党建立新型政治秩序之后，其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为城市化付出很大代价，在某种意义上却又成为城市化发展的瓶颈。为了加快城市化步伐并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政府积极引导乡村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即由原来的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工业化，在此过程中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给乡村城市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其充满生机。以此为契机，中国许多乡村都通过举办乡镇企业实现了乡村经济转型与乡村城镇化。与此同时，由乡镇企业促动的城市化道路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就认为乡镇企业是推动乡村城市化的一个有效途径，并且给以往贫穷的农民生活增加了稳定的收入，使乡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与发展。可见，费氏笔下的开弦弓村不失为江南农村实现城市化的一个典范。从学理和实践层面观察，可以断定发展乡镇企业是乡村城市化的—种成功模式，但问题是这种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中国的区域差异显著，南方的乡村城市化经验是否适合于北方村落？事实证明，山西省太原市郝庄村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在乡镇企业带动下实现经济转轨的一个成功范

本，同时在这一经济变革过程中实现了乡村的城市化道路。然而在这一乡村变迁中，诸多问题值得探讨与深思，如乡村是如何实现经济变革的？在经济变革过程中国家与乡村之间关系如何？为何偏偏某些村庄能够成功实现乡村经济变革且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城市化又是如何发生的？这一乡村城市化的进程是完全现代式的抑或是传统与现代的联姻？乡村城市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城市化对中国传统的乡村秩序有何影响？乡村经济的成功转型与城市化经验对当代的新农村建设有何启示？

结合以上社会转型期的相关问题，如要对山西乡村经济变革作一深入探讨的话，太原郝庄村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成功变革是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作为一名山西人，大家或许都听说过太原的服装城而不一定知道郝庄村，事实上服装城能有今日的发展，就是郝庄村紧扣时代脉搏、快速地脱离传统农耕生产转向具有特色的服装批发与销售业经济而成功实现乡村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并走上城市化发展轨道的。具体言之，郝庄村是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在政府导向作用下，其经济从以土地生产为主的传统小农经济转变为村民“离土不离村”的服务性经济，即由第一产业转向了第三产业，昔日的乡村风貌已不复存在，处处是洋溢着现代气息的高楼大厦和服务业。它的经济改制与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在山西全省首屈一指，在太原市同类乡村中亦是遥遥领先。郝庄村这种由农从商进而通过发展乡镇企业逐步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在全国一些典型乡村经济转轨与城市化案例中同样别有特色。从这些方面来讲，本课题选择集体化到改革时代郝庄的经济变革为个案来探讨转型期中国乡村经济的转变轨迹、政府与乡村及乡村内生性变迁等诸多问题是富有研究价值的。而且，对这些问题的透视又是解读中国乡村经济现代化与乡村社会分化及整合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学术价值而言，乡村因其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学界对社会发展的现实关怀而凝结了研究者的诸多情结。农村改革及其引发的对农村发展和国家对乡村建设历程的反思使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将目光投向中国农村，可以说中国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城乡关系问题已成为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热点——乡村发展的终点或最终归宿是城镇化，而城镇化或城镇化研究的起点则在于乡村。

从具体研究方法而言，“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对本课题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从社会史角度探讨乡村问题乃至中国乡村经济的社会转型是以一种全新视角对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解

读，亦是一种从微观分析发现宏观历史的研究方法。由于中国区域差异显著，各地社会文化迥异，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着很大不同，由此形成的地域经济千差万别，而且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故有必要通过个案以深描的手法研究区域社会，进而以区域回归整体的追求来探讨国家政治作用下的乡村经济变革历程及其基本的路径选择。

从实用价值而言，通过盘点一个村庄从集体化到改革时代再“集体化”的社会历史变迁及其内在的权力运作逻辑、经济发展的联系、国家与乡村的关系、乡村内部的分化，可以展现乡村社会在这一历程中的发展图景及其所取得的可喜成就。同时，亦希望通过本课题研究探寻现实“三农”问题的历史源流，为新农村建设和中国的农村社会工作提供历史借鉴。

二 与课题相关的学术成果

本课题关注的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经过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从而脱离农村身份和形象并融入省会大都市的乡村变迁。它的这种变迁主要缘于国家政治指引下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但直到现今鲜有人问津。故研究者对先前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史梳理时将有选择性地检视与之存在较大关联度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乡村工业化和乡村城镇化方面的有关学术讨论。

人类共同体自诞生以来，农业问题即备受关注，而对于以农立国的传统中国更是如此。近代中国，在其自身经济演变规律和西方在华势力影响下，以农为主的经济在逐步嬗变，向着适应历史演进脉络的方向发展。时人对其关注亦越来越多，特别在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民族—国家的构建，社会精英或精英集团对农业乃至乡村经济不断给予重视，如国民党的“二五减租”、地方势力的村治、中间力量的各种乡村建设运动和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等。当然，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对农村经济的变革是最适应的，亦是影响最深远的。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现代学者在对传统乡村社会经济问题进行不同程度探讨和分析时，其研究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同样验证了由土地关系引发共产党革命的合理性。此类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海外学者黄宗智和国内知名学者费孝通等人的成果。

他们以区域史研究的角度展现了中国农村经济变迁的历程和缘由，以及乡村经济对中国政治变化的影响。如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利用“满铁”调查资料对河北和山东西北部乡村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土地经营模式进行了分析，认为近代华北乡

村小农经济受农业商品化和农村社会两极分化影响，乡村经济由租佃性农场向经营式农场转变，而且人口增长和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促使社会分化日益严重和乡村文化共同体解体，进而导致乡村革命。^① 黄氏在其类似主题的另一研究中，通过考察长江三角洲的家庭经济，认为受商品化和城市化影响，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经济在 1350—1980 年长期徘徊在糊口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这是一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过密化”经济。其理论内涵是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难以解决，结果导致经济边际效益低下，农民难以维持生计，从而由贫困导致革命的发生和延续。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长江三角洲的农村才发生质的改变，农民增收较快并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维持糊口的水平，而之所以产生这种质的突破是乡村工业化得到迅猛发展的结果。^②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详细剖析了江苏开弦弓村的民众生活，认为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收入低下，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其原因是中国的土地政策，即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下从事农耕不足以维持生计，在条件许可下必然会带动副业、手工业发展。但副业、手工业受到打击便会生活贫困，引发冲突，出现家庭、财产与继承、生活、职业分化等问题。解决这种难题的方法就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利用土地优势大力发展副业，并采取“工业下乡”的办法发展农村工业，以带动整个经济发展。^③ 由此可见，他认为农村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土地不均而导致，解决的方法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之后发展乡村工业。

对于 1949 年以来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至于乡村经济转轨问题，国内学界更是予以高度关注。关注原因很简单，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将农业和农村搞好了则中国的一切事情都好办了。当然，1949 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对乡村问题亦倍加关心，试图通过各种政治运动来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其间虽出现过种种失误并给乡村造成一些灾难，但他们一直在实践中摸索、总结经验，以寻找适宜的发展道路。如在国家政治干预下乡村经济由分散经营到集体化，

① 参见 [美] 黄宗智 (Philip C. C. Huang)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② 参见 [美] 黄宗智 (Philip C. C. Huang)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③ 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再到集体化的短暂破灭进而又到“集体化”的过程，就是乡村经济乃至乡村社会在实践中的一次重要转型。而这一过程中集体化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它取得的成就、出现的问题及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阻碍乃至破坏都受到学界不同程度的关注，并且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①

① 据中国知网检索，截至目前学界对中国集体化研究比较深入的成果主要有：邓群刚的《集体化时代的山区建设与环境演变——以河北省邢台县西部山区为中心》，南开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王胜的《集体化时期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卢晖临的《集体化与农民平均主义心态的形成——关于房屋的故事》，《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郭于华的《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驢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梁敬明的《集体化及其困境：一种区域史的分析思路》，《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纪能文、张步先的《从合作化到集体化：关于农业合作理论的演进及其现实考察》，《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葛玲的《集体化时期广东省农村工业的起步（1952—1984）》，《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郑卫东的《集体化时期的分配制度与人口生育——以日照市东村为中心》，《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张健的《集体化时期的农民政治社会化分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满永的《生活中的革命日常化——1950年代乡村集体化进程中的社会政治化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王珏的《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化模式及其伦理难题》，《学海》2004年第5期；李里峰的《土改结束后的乡村社会变动——兼论从土地改革到集体化的转化机制》，《江海学刊》2009年第2期；钟霞的《集体化时期基层社队农业经济效益分析——对山东日照东邵疃村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曹彦鹏的《现代化背景中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基于豫南陈寨集体化运动中农民政治动员的田野考察》，《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6期；张雪敏、邵明辉的《从集体化到合作化：中国农民组织的演变与趋势》，《中州学刊》2009年第5期；冯仕政的《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1—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严闻广的《国有化和集体化互转的途径与方法》，《学术研究》1991年第6期；游海华的《集体化时期农村人口流动剖析——以赣粤粤边区为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李金铮的《问题意识：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解释》，《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何燕的《集体化时期山东淄博沈家村宅基地的演变与思考》，《史学月刊》2013年第6期；项继权的《乡村集体化与民主化——若干乡村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2期；孟庆延的《“生存伦理”与集体逻辑——农业集体化时期“倒欠户”现象的社会学考察》，《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李海金的《集体化时期农民政治身份及其影响的变迁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2期；李金铮、刘洁的《劳力平等性别——集体化时期太行山区的男女“同工同酬”》，《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7期；苏少之、陈春华、王军的《关于20世纪50年代农业集体化的几个问题的反思》，《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朱金鹏的《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时期自留地制度的演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黄英伟、李军、王秀清的《集体化末期农户劳动力投入的性别差异——一个村庄（北台子）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温锐、杨丽琼的《社会心理与高潮迭起——试析农业集体化运动一哄而起的原因》，《历史教学》1994年第8期；温锐的《毛泽东关于农地所有制形式变革的认识与实践的再探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岳谦厚、贺蒲燕的《山西省稷山县农村公共卫生事业述评（1949—1984年）——以太阳村为重点考察对象》，《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5期；岳谦厚、范艳华的《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闹社风潮》，《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岳谦厚、杜清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农村扫盲》，《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等等。

然而,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乡村集体化都未能使绝大多数农村摆脱贫穷面貌, 亦未能使农民增加收入及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所以,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乃至80年代以后摆在国人面前的最大问题仍是探寻乡村发展的经济出路, 以尽早使农民富裕起来。那么, 如何才能使农村摆脱贫穷并使之富裕起来? 这不仅仅是政府和农民关心的问题, 同样亦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重要话题之一。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探索, 较为欣喜地是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惠农政策大力推行以及知识分子实地考察和研究下, 我们终于找到了农村经济的转型之路, 即通过乡镇企业走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以带动乡村经济转型。可见, 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在一定时期是有利于乡村经济发展的。随之, 学界对于农村的这种新兴发展动力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学术探讨和经验总结。

当然, 在涉及具体问题的探讨时, 目前学界还存有较大争议, 主要表现为: 在中国农村广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到底是农村工业化还是乡村城镇化更利于乡村经济成功转型? 或是二者的结合更利于乡村经济现代化? 针对这些问题, 学界通过不同的个案研究做出了不同的解释结果, 但归纳起来绝大多数赞成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模式, 特别肯定以服务业为纽带的乡村城镇化模式。具体而言, 可归结为以下三类。

(一) 围绕乡村工业化与乡村经济转型问题的学术探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乡村工业的迅速崛起。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形成新的工业化动力, 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形成新的城镇化模式, 这主要表现为工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是自身资金积累而不是由中央政府通过国家计划予以安排; 劳动力的非农化就业及其向城镇的聚集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进行, 并在广大城镇积淀了大量“外来人口”。与传统计划经济下城镇发展完全由国家计划推动不一样, 这种新的城镇化机制被有关研究总结为“自下而上”的城镇化。而乡村工业只是“自下而上”城镇化在特有体制与发展背景下的一种实现形式, 其普遍性受到多方面制约, “自下而上”城镇化的真正动力来自并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①

胡必亮的《工业化与新农村——山西屯瓦村个案研究》以山西原平

^① 参见杨云彦、陈浩、陈金永《乡村工业嬗变与“自下而上”城镇化》,《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市（县级市）屯瓦村为考察对象，从微观视角讲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发生急剧社会变迁过程中有些位于农村地区的“工业村”转型为当地工业中心，但亦有一些“工业村”不仅没有成功转型，相反却因企业不断地从村里迁出而导致“工业村”重返农业村。原平屯瓦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其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队办集体企业有10多家，是当地有名的“工业村”，但后来由于社会转型的各种因素，村里的这些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转移到当地县城，使屯瓦村又成为一个农业村。然而在2003年以来，伴随着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时机的到来，加上屯瓦村在山区发现铁矿石，于是以前从屯瓦村迁出去的企业家又重新回到村里，投资建厂，开采铁矿石，进行初步加工，进而使屯瓦村在新时期又见到了工业发展的曙光。^①

此外，胡必亮还以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项东村为个案，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农村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城镇化，从总体上讲这一立论是没有问题的，但有时亦存在某些问题。如在苍南县龙港镇没有发展起来之前，像项东村等发展都不错，许多甚至直接构成20世纪80年代非常有名的“温州模式”中十大专业市场中的重要市场，钱库镇就是当时十大专业市场之一，而其所辖项东村更是全国知名的模范村。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龙港镇发展起来后，周围不少镇和村都没有得到很好发展，反而发展势头减缓，有些甚至出现衰退现象。出现衰退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受到市场经济冲击，但关键在于地区发展战略的设计与规划必须充分考虑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即尽可能避免出现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分割发展和失衡发展的问题。^②

张燕韡认为农村工业化是在传统二元结构体制的历史条件下启动和发展起来的，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工业化形式，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农村工业化实践的不断丰富和深化，其内生型的传统发展模式发生很大变化，出现与城市工业化加速融合的趋势。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推出和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规模性转移，农民工跨省区远距离大规模流动，将转向分散型省内流动或就近向小城镇转移。我国城镇化发展重心亦随之下移，从过去的以

^① 参见胡必亮《工业化与新农村——山西屯瓦村个案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参见胡必亮《城镇化与新农村：浙江项东村个案研究》，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

大中城市为主逐步过渡到以小城镇为主，创造了农村工业化模式与小城镇化发展路径相协调的发展模式。^①

而具有“天下第一村”美誉的华西村的经济转轨首先是通过工业化，由工业化进而带动了城市化发展，创造出了“大、新、富、美”的乡村品牌。“大”指的是经济总量大、发展变化大和对国家贡献大，村有固定资产 70 多亿元和年实现销售收入 307.8 亿元的上市公司 5 家，从 1988 年到 2005 年的 17 年间销售收入翻了 300 多倍，在 2003 年村里向国家缴税 3 亿多元，到 2011 年中心村 1500 多口人人均缴税超过 40 万元。“新”是指发展思路新、体制机制新和产业产品结构新。华西村紧随形势变化，由 20 世纪 70 年代“造田”实现农业现代化，80 年代“造厂”实现农村工业化，90 年代“造城”实现农村城市化。在体制机制方面，只要符合华西实际、有利发展的就大胆尝试，使华西村既有公有的又有私有的，还有公私合作的，创造了公私双富有，且创立了四大支柱产业即冶金、建筑、纺织和旅游业，自行研究、设计、开发制造的扁钢项目是目前国内最先进、流水线最长、技术含量最高的自动化生产线。“富”是村富民富。“美”是村容村貌美、生态环境美。^②

(二) 关注由乡村工业化向城镇化转变对乡村经济转轨影响的学术研究

为何由关注乡村工业化又转向城镇化呢？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乡村工业化的发展，尤其乡镇企业的大规模发展，曾一度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增长，但后来随着国家政策变化，某些乡村工业遭受倒闭的困境。对于这一转型期出现的问题，某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如黄文华认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使乡镇企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体制优势，而成为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但进入 90 年代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使乡镇企业体制优势消失，由于乡镇企业具有明显的社区特征，在发展之初又没有考虑城乡工业的互补性，致使城乡工业出现高度同构性，面临强大的市场竞争，高度分散的乡镇企业因其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不足而无法与城市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相抗衡，再加上体制原因，其发展

^① 参见张燕韩《农村工业化模式演变与城镇化路径选择》，《经济问题探索》2007 年第 7 期。

^② 参见《聚焦华西村辉煌 50 年》，《江苏农村经济》2011 年第 11 期。

举步维艰。因此，只有立足于乡村本身，与大中城市发展协同，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在强调城乡工业互补的前提下促成原来分散的乡镇企业向中型城镇集中，使小型城镇成为围绕大中城市环状带和市场空间及要素集聚的载体，以此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同时以市场为导向推动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比较效益，增加农民收入。^①

对于乡村工业化是否有利于推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这一问题，方辉振认为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存在很大缺陷，其主要表现于：（1）造成土地资源巨大浪费；（2）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污染；（3）严重损害聚集经济效应；（4）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因而主张中国应走城郊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道路。所谓城郊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指郊区农村产业结构非农化、土地利用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生产现代化、居民生活城市化，是扩散型、转化型、聚集型相结合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它的主要优点表现在工业、人口、就业岗位和服务业从城区向城郊迁移的离心扩散过程，又是郊区农业调整产业结构和生活结构及发展工业和转变身份的转化过程，还是乡村人口、乡镇企业及其他生产要素从乡村向城郊迁移的离土又离乡的聚集过程。^②

何光耀等人则认为，加快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节点。工业化作为城镇化的第一动力，其功能主要是实现城镇的量态扩张；在向后工业化时期转变的阶段实现城镇化的质态提高，主要应依靠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后续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有利于聚集人气，改善小城镇交通、通信条件，完善农村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便于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生活环境，增强农民进城进镇的吸引力，同时服务业的高度发展又能使人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在小城镇相对密集和高速流转，从而为繁荣小城镇创造条件。^③ 惠锡清撰文亦指出，农村工业化是农村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农业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基础，乡村城镇化是农村现代化的集中表现，服务社会化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纽带，农民知识化是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关键。^④

① 参见黄文华《城镇化：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老区建设》2002年第12期。

② 参见方辉振《城郊工业化城市化与乡村工业化城镇化比较研究》，《江淮论坛》2006年第1期。

③ 参见何光耀、钱洪明《服务业托起未来——苏州农村第三产业发展的调查与思考》，《江苏农村经济》2000年第3期。

④ 参见惠锡清《探索独特的中国乡村城市化之路》，《农业经济问题》1999年第9期。

(三) 从学界现有对乡村经济成功转型案例的研究中可看出,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旨趣集中在城镇化与乡村经济转型问题上,且在其研究中亦比较认同通过乡村城镇化来带动乡村经济的现代化

乡村的城镇化古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古社会的集镇。而且,对于乡村城镇化这一问题,学界在早期集镇研究中就注意到了集镇发展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还可带动乡村经济转型。最先研究中国市镇史的是日本学者加藤繁,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都市形态问题,其研究成果结集于《中国经济史考证》(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共3卷)。此后还有曾我部静雄的《唐宋以前的草市》(《东亚经济研究》第16卷第4期)、周藤吉之的《宋代乡村中小都市的发展》(《史学杂志》第59卷第9期)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欧美学者开始重视中国历史上的城镇化问题,其中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在乡村集市方面的研究相当突出,其《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最初连载于《亚洲研究》(Vol. 24. 1—3, 1964—1965),以区域体系和中心地理论着力于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城镇化过程,在中外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学术影响。^①

中国本土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开始重视江南市镇等方面的研究,其代表者有傅衣凌、傅宗文、王家范、陈学文、樊树志、包伟民、蒋兆武以及台湾的刘石吉等人。他们关注的共同点是乡村的“都市化”^②问题。^③其实,乡村都市化概念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我们现今的乡村城镇化。如傅衣凌在研究明清社会经济时就曾涉及乡村小城镇的研究并提出明清经济转轨说,认为当时江南商品经济发达达到了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现象。^④乡村集镇研究虽受到学界重视,但有些集镇研究往往忽视了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吴滔就指出这一缺憾,他认为过去有关江南市镇的研究一向将市镇本身的讨论当作优先任务,对于市镇周边农村或市镇与农村关系的探讨则显得不足,即便有之亦往往只具有作为市镇研究附属品的意味。

^① 参见陈映芳《传统中国再认识——乡土中国、城镇中国及城乡关系》,《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

^② 乡村“都市化”指的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和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土地的过程。

^③ 参见冯贤亮《明清时期中国的城乡关系——一种学术史理路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④ 参见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中华书局2007年版。